

论道德教育的城市遭遇

高德胜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 城市化是当代人的遭遇,也是道德教育的遭遇。城市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城市里充满着陌生人。陌生的都市人有两副面孔,一副是自由与理性,一副是冷漠与孤独。在一个城市主导人类生活的时代,教育不能没有城市精神,又不能迁就城市伦理。在适应城市生活的同时,超越陌生人伦理,是道德教育的当代使命之一。

关键词: 城市; 陌生人伦理; 遭遇; 道德教育

如今,人类的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加速,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将过上城市生活。但“城市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例并不能完全或精确地衡量当代世界‘城市化’的程度。城市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比城市人口的比例显示出的还要大。城市日益成为现代人的栖息地和加工厂,是发动并控制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中心。”^[1]另外,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这个农业性的乡村社会已经开始融入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潮流之中。从一个根深蒂固的乡村型的社会转型到一个城市型的社会,不仅仅是经济、政治的问题,还是文化和伦理的问题。关注现代人的生活是道德教育的时代使命,而城市已经成为“现代人的栖息地和加工厂”,因此,道德教育就不能不关注城市、城市生活,不能不具有城市视野。

一、城市:陌生人的世界

齐格蒙特·鲍曼认为我们生活的城市世界“几乎被陌生人所充斥”,看起来像一个“普遍的陌生世界”,“我们生活在陌生人中”,对他人而言,“我们本身也是陌生人”^[2]。为什么城市,尤其现代化都市是陌生人的世界呢?

马克思·韦伯指出,“与‘城市’此一名词相关的概念纯粹是数量性的:它是个大聚落。”^[3]也就是说,大量人口是构成城市的必要条件。但社会学的研究揭示,一个典型的都市人,其社会网络互动中的可能联系数为 1500,而实际网络中的平均联系数只有大约 400,而在这 400 个联系中,大约只有 20 个是“积极的”,大约只有 10 个是“互动的”,大约只有 5 个是“亲密的”,只有大约 1 个或 2 个属于“知己型”。^[4]人口密度的加大,也即大量的人口聚集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意味着距离很近的人也无法彼此熟悉。另一方面,人口密度的增大使每一个人都成为自己潜在和直接的威胁,导致自动化的心理防卫和行为排斥,无形中降低了互相认识与熟悉的可能性。

人口众多本身意味着多样性,“城市拥有众多人口,人们的兴趣、品位、需求、感觉和偏好五花八门、千姿百态。”^[5]另外,城市人口一般不是自我繁衍的,而是来自四面八方,种族、民族、血统、地域、经历、习俗差异巨大,导致城市人口的高度异质性。差异意味着陌生,如果别人与我们的相同之处多过不同之处,熟悉感就会油然而生,反之亦然。差异也意味着疏远,而疏远又反过来阻碍了人们相互间的交往和熟悉。此外,数量多、密度大,又异质的城市人口不是静态的,而是流动的。城市中生活的人属于整个城市,在整个城市范围内寻找机会,居住地、工作地点和工作种类经常变化,使长久关系的建立和维持变得越来越

困难，人与人之间熟悉不起来，多停留在陌生状态。

城市里没有单纯的自然或物理空间，城市空间具有社会性。作为社会关系的载体和容器，城市空间既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具体结果，也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预先假定”^[6]。希腊格言充满了智慧：“我们建造了房子，房子也创造了我们。”^[7]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建造了城市，城市也塑造了我们。”

城市作为一个陌生人的世界，其陌生性已经预设在城市空间里了。我们可以从街道、购物中心、居民区等典型的城市空间中看出这种陌生性预设。作为城市的“血管”，街道有自己的社会性预设。街道提供给人的，仅仅是一个通道，其内在的逻辑是人的快速移动。也就是说，街道不是为人与人的互动服务的，甚至不容许互动的发生。人们在街道上相遇了，但只能看到众多转瞬即逝的面孔，因为街道推着你快速向前移动。如今，街道与汽车连体，使街道的功能单一化。坐在汽车里，汽车将人们分割成一个个孤立的单元，每个人好像都有了一个金属罩子，除非发生意外事故，否则罩中人是不会有哪怕一丁点的交流的。

城市里的许多商业场所，诸如购物中心、展览馆、电影院、运动馆、商业街等，表面上看都是供居民共享的公共空间，但在这些公共空间里，人们几乎“没有任何实际的、社会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因为这些“公共空间鼓励的是（消费）行动，而不是（人际）‘互动’”。^[8]商家设计这些公共空间，目的在于鼓励人们将注意力全部放在消费对象上，而不是让相遇的陌生人进行互动和交流。在现代都市里，居民区里的居民失去了过去时代工作单位的共同性，人们不再是根据工作单位，而是根据经济和社会地位而住在一起。居民区通过门墙、保安、门卫将自己与外面陌生而危险的世界隔离开来，但居民区内部，“由于没有任何的工作和职业联系，同一个社区的人，尽管近在咫尺，却行同路人。”^[9]所以“永远有多远，对门就有多远”是我们时代都市生活的真实写照。每家每户的大门及门锁都是一种防备性设备，人们通过“猫眼”看到的邻居是“家门口的陌生人”^[10]。从字面上看，“城市”一词由“城”（防卫用的城垣）和“市”（交易的场所）构成。也就是说，单从构词上看，市场交易是城市的本来功能之一。乔尔·科特金的城市史研究发现，“早在发轫之初，城市区域就已扮演了三种不同的重要功能：构筑神圣的空间；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拥有一个商业的市场。”^[11]内在于城市的市场交易功能，在现代都市中发展到了极致。在过去时代的小城镇和乡村，人们依赖熟悉和亲近的感情组织群体生活，而在现代都市，这样的生活明显不合时宜。都市是一个大聚落，人口复杂多样，不要说相互熟悉和亲近，即使是一个短暂的照面都蕴藏着麻烦与危险。陌生的面孔是深不见底的，没有任何保障，所以人们转而信任货币。西美尔精辟地指出，“现代人的生存在任何时候都仰赖于数以百计的由货币利润滋养着的联系渠道。”^[12]因此，如果说以往的乡村社会是以血缘、亲情和亲近等来编织社会关系的话，现代都市则以货币为中介编织社会关系，货币成了“编织社会之网的蜘蛛”^[13]。

西美尔认为“城市生活已经将人为了生计而与自然的斗争变成了人为了获利而与其他人的斗争”^[14]，这话虽然有点绝对，但却十分尖锐，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城市生活的激烈竞争性。城市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空间和资源的潜在竞争者，人们之间存在下意识地戒备和敌意。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之所以与他人交往，往往不是因为其个性和人格的魅力，而是其有用性。因此，在城市生活中存在的人际互动，多数是“工具性互动”（instrumental interaction）^[15]，即为了达到个人的某种目的而与人发生的互动。他人如果无法为满足自己的目的服务，就根本无法引起注意；他人如果对实现自己的目的有用，也只是自己实现目的工具，彼此之间同样不会因此而发生持久而深入的心灵纠结。

在血缘或地缘共同体中，人们彼此“知根知底”。在这种共同体中发生的互动是“完整的人与完整的人”之间的互动。而在城市生活中，由于社会分工的高度发达，都市人不是以完整的人，而是以高度分化的社会角色与他人接触的。人们以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示人，见

到的同样是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完整的人是特别的，不可替代的，而社会角色则是均质的，由谁扮演都一样，所以是可以替代的。在这种互动之中，往往是只见社会角色，不见角色背后的人，人与人之间熟悉不起来，也不需熟悉。此外，即使一个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可以投射其人格，但也只能是人格的一部分，是完整的人的一个“碎片”。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彼此遭遇的只是对方的碎片，同样无法接触一个整体的人，正如托夫勒所言，“我们不是和整个的人建立联系，而只是接通他人格的一个模件。每个人都可以被看作几千几万个这种模件的独特的集合体。”^[16]

二、双面的陌生人

都市人具有的双面的性格，一面镌刻着“自由与理性”，一面铸写着“冷漠与孤独”。

哈维认为“城市生活与个人自由——包括探险、发明、创造和定义新生活方式的自由——之间的联系有着悠久的历史。”^[17]那么，城市生活与自由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城市生活的自由，首先源于城市陌生性的人际关系。在一个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全面而深入的，每一个的言行都会对他人产生影响。在一个关系紧密的社会里，生命之间“盘根错节”，命运息息相关。彼此之间有相当多的期待和责任。这样的关系，从积极的方面看，是人与人的“相濡以沫”，从消极的方面看，是个人自由的丧失。在城市这样的陌生人世界里，人与人之间之间的联系是局部的、角色性的，但“局部联系是同自由分不开的”^[18]。

城市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仅是局部的，还是短暂的。托夫勒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分为长期关系、中期关系和短期关系。“总的说来，在我们的生活中，人际关系的持续期是越来越短了。”^[19]持久的关系是温暖的，但彼此的牵挂不可避免；短暂的关系是功利的，但却是了无牵挂、自由自在的。

都市生活的自由与都市生活的匿名性密切相关。自由的感觉既来自外在约束的解除，也来自内在自我约束的松弛。熟人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注意，这既是一种关心，也是一种监视和外在约束。生活在熟人中间，由于监视的存在，人往往会检点、约束自己的言行，以保持自己在他人心中固有的形象，外在约束变成了内在约束。而在陌生的环境中，每个人都是匿名的，彼此不知道对方是谁。人们很少过于注意陌生人，因为“有礼貌的不关注”^[20]是城市生活的一个基本规则。“有礼貌的不注意”是陌生人之间达成的一种默契：我们看到彼此，但互不冒犯。在一个没有人知道自己是谁的陌生空间里，放松、放肆、甚至放纵一下都是可以的。

城市生活的自由还表现在对个人隐私的尊重上。所谓隐私，实际上就是自我对外在干扰和接触的排斥。有无这种排斥权利和能力，换个角度看就是有无自由。“隐私是大城市生活的一个礼物，受到深深的珍爱和小翼翼的防卫。”^[21]城市生活中，人们彼此清楚地划出界限，用空间设计和人际互动规则等多种生活策略保护自己和他人的隐私。比如，单元住宅楼的设计，很多方面就是为了满足人们保护隐私的需要。而城市生活中的“有礼貌的不注意”这一交往原则，也避免了彼此对个人生活的干预。

城市生活的自由还通过都市人的个性折射出来。城市人的个性多样性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客观的原因在于，城市人口的多样与异质，天然存在着不同个性的人。主观原因在于，追求个性是都市人的一种心理补偿需要。都市里高大的建筑物、森严的官僚体制、庞大的人口、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等等客观化的力量对个人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威压，“作为对这种文化过度客观化的一种反应，过度的主观主义在大都市里达到了顶端。”^[22]为了追求个性，各种方式的“过度”、甚至是异端、孤僻的行为都在都市里找到展示空间。R.E.帕克指出，“城市生活使得各种人类个性与特征充分地展示出来，并将其放大。”^[23]城市生

活对多样个性的容忍，实际上折射出的是城市生活的人际关系的面貌和自由。

城市生活的自由与都市人的理性密切相关，没有都市人的理性和克制，城市生活的自由度就会大打折扣。与乡村生活的情感性不同，都市人用头脑代替心灵来做出反应，“智性已被视为用来保留个性生活以抵御都市生活的强大威力，它亦扩展到很多方面并统合了许多离散的现象。”^[24]

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方面是因为都市人口众多，每一个人都要接触比过去时代多得多的都市人，不可能将自己对待亲朋的感情投注到遇到的每一个身上，只能采取理性的态度处理以减轻自己的心理负担。另一方面，都市生活的千变万化，迫使都市人“发展出一种保护自己不受危险的潮流与那些令他失去根源的外部环境的威胁。他用头脑代替心灵来做出反应。”^[25]

都市人的理性表现在城市生活的诸多方面。如前所述，都市陌生人相见是不可避免的，但却以“有礼貌的不注意”刻意保持距离，避免互相卷入，“不要与陌生人说话”成为一个行为戒律。当然，在都市生活中陌生人之间完全不交往是不可能的，“有礼貌的不注意”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在不得不交往的情况下，都市陌生人则遵循剔除情绪和激情的“礼仪客套”（civility）原则。鲍曼认为，礼仪客套不仅仅是都市生活中个人的交往技巧，还是都市“社会环境的一个特色”。^[26]

在熟人社会，熟悉和了解就是一种担保。但在由陌生人组成的城市，“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27]从这个角度看，都市陌生人之间的交往多是一种契约性交往，因此在都市生活中，理性化的规则和法律代替情感、道德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调控手段。“在一个规则控制的境遇中，行为者不是面对另一个人，而是面对一个‘言明的要求’；真正的联系发展在行为者和规则之间，而另一个人，行为的原因或目的仅仅是在权利和义务的棋盘上活动的棋子。”^[28]确实，在一个功利的、角色性的交往关系中，交往的对象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契约和规则的遵守。而法律是更坚硬的规则，在法律的理性森林里，根本没有情感的容身之地。

如前所述，在城市生活中，货币是编织社会之网的“蜘蛛”。由这一“蜘蛛”编织的社会关系充满了理性的务实态度和精于算计。当然，我们很难说得清楚是理性态度导致货币关系的建立，还是货币关系孕育了理性态度，只能说都市生活为二者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沃土。在这种理性务实态度的指导下，非理性的、本能的、情感的冲动都被尽可能地排斥掉了。

自由与理性只是都市人的一面，都市人的另一面则冷漠与孤独。对那些刚进入都市的人来说，都市人的冷漠往往令其费解、无法忍受。对自己的冷漠，都市人也许已经习以为常，因为这已经是都市人生活的常态。冷漠作为都市人的相处之道，不是无缘无故的，最根本的动因在于通过冷漠来寻求自我保护。如前所述，都市生活纷繁复杂，都市人不可能对每一个遇见的人都做出反应，更何况不知底细的陌生人在很多情况下还意味着巨大的威胁和危险。西美尔将都市人的这种冷漠的生活态度称为“自我退隐”（reserve），即“基于自我保全而采取的一种社会性的消极行为”^[29]。

冷漠的处世之道，作为自我保护的方式，体现在都市人生活的诸多方面。“不要与陌生人说话”是都市生活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无法回避的时候则采取“礼貌的不注意”方式进行处理。而“礼貌的不注意”这种节制、理性的相遇方式背后则是深深的冷漠：“把陌生人当作一个没有真正的事情能够发生的、没有面孔的、黑色的幕布。”^[30]更进一步，在不得不进行交往并建立关系的时候，则尽量将这种关系局限在有限的范围内，比如局限在职业角色和商业服务的范围内，用“礼仪客套”这种冰凉的方式来处理相互间关系，避免更深地卷入。因为有限的关系意味着有限的责任，陌生人之间除了这有限的责任之外，再也没有其他责任，他人的一切都与自己无关。

都市冷漠还体现在陌生人之间以利益交换关系作为主导性关系上。都市里充满了陌生人，彼此之间充满了戒备，但又必须相互依赖。都市人对这种既戒备又依赖的关系有一个智慧性的化解：将彼此之间的关系限定在利益交换上。通过利益交换，陌生人既满足了自己的需要，又可不与他人发生深入的交往。人们之间以货币为桥梁建立了关系，使彼此之间的关系变成一种有中介的间接关系。与一个人交往，我们看中的是其有用性，看其“价值几何”，至于这个人有什么遭遇，则与我们没什么任何瓜葛。滕尼斯在论及这一点时指出，“没有人会为别的人做点儿什么，贡献点儿什么，没有人会给别人赏赐什么、给予什么，除非为了报偿和回赠，而且报偿和回赠与他给予的东西相比，至少要同等。”^[31]

陌生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不能没有规则和法律的调控。史蒂芬·图尔敏认为，“在亲密人的伦理学中，自我判断就是全部，对严格规则的肯定是很少的。”，而“在陌生人的伦理学中，对规则的遵守就是全部，自我判断的机会很少。”^[32] 也就是说，都市生活将规则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用规则来表达自己的冷漠：遵守规则是人际关系的全部，只要我遵守规则了，我的义务就到头了，其他的一切都与我不关，哪怕你正在经历生死存亡的考验。比如，不是多次发生了救护车被卡在收费站导致病人死亡的案例吗？收费站的工作人员理直气壮地在执行收费的规定，至于病人的死活，那是与其无关的。^[33]冷漠是对他人的忽视，而这种冷漠具有“回归性”，也会伤到自己。都市人在冷漠地无视他人存在的同时，也造成了自己的孤独。

都市人际关系的片面和短暂使个体摆脱了亲密团体对个人情感的控制，获得了自由，也是个体失去了他人的关怀，失去了情感交流和依靠。在一个片面的陌生人交往中，个体呈现给他人的只是自己生命的一个模件，他人无法了解你整个人，因此无法对你产生情感。同样，陌生人之间交往的短暂性，使得他人转眼就忘了你，这既使你在人群中感受自由，也使你在人群中体味孤独。陌生的茫茫人海是沉默不语的，既不干预你，也不关心你。无论你兴奋也好，忧伤也罢，生也好，死也罢，都无法在浩大的茫茫人海中激起一点涟漪！

都市生活的匿名性，既给都市人无人能识的自由，也给了都市人无人能识的孤独。在一个有陌生性预设的城市空间里，社会距离得到维护，社会亲近遭到冻结，使人可以在人来人往的街头孤独地低声“啜泣”。在隐私权和个性要求的助推之下，都市孤独已经渗透到家庭生活之中。迈克尔·施罗特对此有形象的描述：“由于在大社会里不能避免踩上彼此脚，所以我们走进我们单独的家并关上门，接着走进我们单独的房间并关上门。”^[34] 门关上之后，世界的纷扰和他人的威胁也被关在了门外，留下的是门内的形单影只！

三、教育：超越陌生人伦理

城市是教育不可回避的时代遭遇，而城市作为一个陌生人的世界，有自己的伦理逻辑。在一个城市化不可逆转的时代，教育也要“过城市生活”，因此首要的是适应城市生活和城市伦理，培养受教育者的城市精神。当然，教育的适应应该是一种积极适应，在适应中有超越。教育在培育城市精神的同时，还应自觉地抵御、消解、弥补城市生活的冷漠与孤独。

城市生活是当今人类主导性的生活样态。在农业社会，城市虽然存在，但是“农业海洋里的孤岛”^[35]，依附于广大农村地区。如今，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已经颠倒过来，“城市已经成为整个工业社会的象征和现实。它不再像过去那样与社会的其余部分处于纯粹的机械关系当中，而是占据了一个越来越有机的整体的核心。”^[36]教育在一个城市主导的社会中生存，如果不具有城市视野，无异于愚蠢地自闭于整个社会体系之外。

教育具有城市视野，在中国这个带着悠久农业历史而进行现代化、城市化转型的国家更具有迫切性。中国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改革开放以后的城市化进程提速，几十年来已经有上亿的农村人进入城市定居下来开始了城市生活，每年还有上亿的农村人口以

打工等社会流动方式进入陌生的城市空间谋生。在城市内部，城市生活也在加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中国人过去几千年一直遵循的行为准则，比如“人情法则”如今在城市生活中已经过时了，而新的行为准则还没有建立起来，新的价值观念还没有生成。在建立新的行为准则、生成新的价值观念的过程中，教育大有可为。

或许有人 would 认为，虽然城市化进程在加速，但中国一半以上的人口还生活在农村，农村教育不一定要有城市视野。这种说法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并不正确。在城市化的今天，农村教育更应该具有城市视野。且不说当今农业对城市工业的依附关系，单就正在接受教育的农村儿童将来可能走向城市而言，农村教育就不能不面向城市。虽然乡村生活有城市生活所没有的亲密、信任等特征，但不可否认，乡村生活也有许多陋习和落后于社会发展的地方，需要接受城市文明的洗礼。由于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相比，传统农业社会生活的传统更加牢固，接受城市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难度更大，更应该加强有关城市精神和价值的教育。

因此，一个城市主导的时代，教育不能没有城市视野，不能不具有城市精神。教育要适应城市生活，主动将城市生活所内生的权利观念、契约意识、法律观念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

教育应该具有城市精神，但并不意味着将学校场域塑造成陌生的城市性空间。社会学的研究揭示出，人有一种“接近的冲动”，即个体在一种在大家共同在场或者面对面的情境下与别人相见的需要，这种需要在城市生活已经电子化的今天，变得更加迫切。^[37]作为成长中的未成年人，其与亲人、朋友甚至陌生人“接近的冲动”更加强烈，如果得不到满足，后果严重。实际上，在都市中生活的成年人，也并不总是生活在陌生的空间中，他们也会经常回到熟悉而温馨的家，在家里舔舔伤口，温暖一下冰冷的身心。但家庭作为“社会减震器”的功能在城市化的浪潮中已经被削弱。与农村社会相比，城市中的家庭结构简单、规模缩小、封闭性强，已经无法独自满足都市人“接近的冲动”。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其它机构来弥补家庭正在流逝的职能，与家庭一起满足未成年人成长中的情感需要。在学校生活中，师生、生生之间“耳濡目染，朝夕相处，这些形式大约可以算做人类关系中最简单、最基本的联系形式了。”所以“学校已经接替了家庭的部分职能，已经有了首属关系的色彩。”^[38]

学校如果能成为未成年人的第二个家，意义将非同一般。白天，父母行色匆匆，忙于自己的工作；晚上，父母忙忙碌碌，耽于家务和应酬，与未成年子女交流沟通的时间少而又少，这已经是都市未成年人的典型遭遇。而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儿童没有兄弟姐妹可以相伴，更加重了未成年人的情感缺失。对这种情况的放任，必将导致一代人的情感缺憾和心理疾患。学校有专门教育儿童的教师，有大量的同龄人相聚，完全有条件分担家庭的部分功能，满足儿童的情感需要。没有情感缺失的儿童，成年之后，以健康的人格来积极适应城市生活的可能性要大很多。因为不缺少关爱，其心灵可能会少一些冷漠；因为不缺少亲近和交往，其交往的能力相应增强，就更可能在陌生的环境中与他人建立友谊，远离孤独。

从实然的角度看，学校生活空间就是一个熟人空间。随着交往的加深，同学之间很快会形成一种类似兄弟姐妹的熟人关系，师生之间也会形成类似父母子女的亲情联系。但学校这个熟人空间与以血缘、地缘等为纽带而形成的熟人空间不同，是一种制度化的熟人空间。学校这种制度化的熟人空间并不排斥制度，适度的制度生活也有利于形成城市生活所需要的规则意识。问题是学校生活的过度制度化，或者说刚性的制度无处不在，导致学校生活的高度等级性、监视性、机械化。这样一来，制度膨胀，而亲切、关心、亲近萎缩，也就使学校失去了熟人空间的基本特性。

抵御城市生活的冷漠，是当代教育的使命之一。因为冷漠的蔓延与深化，损害的是人类生活中最为珍贵的人性和道德感，每一个人都是冷漠的受害者。虽然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无法一力承担这一使命，但可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有所作为。首先是一种针对城市生活的新人际观念的孕育。自由和理性是城市生活本性的表现，但自由和理性并不必然导致冷

漠。城市人如果能够正确运用自己的自由和理性，也可以形成一种“生态观念”。这里的“生态”不是生物学的，而是社会学的，意指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相互依赖性。

学校教育中存在的夸大陌生人危险的倾向需要纠正。以往的教育强调引导儿童对陌生人要礼貌、友善，现在的教育几乎神经质地引导儿童戒备、警惕、甚至敌对陌生人。这一深刻变化反映了城市生活的复杂性和危险性，但也有夸大陌生危险的倾向。学校教育应该把握一个度，既要引导学生在与陌生人的交往中有自我保护意识，又不夸大陌生人的危险，学会有效地同陌生人打交道。与陌生人交往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与陌生人交往的经验，如今的未成年人缺乏的恰恰是这种经验。学校埋头于考试和知识教学，学生接触校外世界的通道被关得严严实实的，封闭性空前强化，这就导致了学生对陌生人充满恐惧，也不知道该如何与之交往。

博爱，是一种超越性的人类情怀，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这种情怀和境界的达成，相当困难。但不能因为困难，学校就完全放弃。学校应该积极探索进行博爱品质培养的路径和方法，进行各种教育尝试。通过努力，即使能够在未成年人心灵之中种下一点点博爱的种子，也可以多多少少抵御一下都市生活的冷漠。诺丁斯关于“关心陌生者和远离自己的人”^[39]的研究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她认为，许多人之所以不能将自己对亲人的关心扩大到陌生人，主要原因在于不能正确认识自我和他人。因此，正确认识自我，正确理解、评价、包容他人应该是遭遇城市生活的学校的教育主题之一。

参考文献:

- [1][美]路易·沃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A].汪民安等.现代性基本读本[C].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700.
- [2][英]齐格蒙特·鲍曼.通过社会学去思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51.
- [3][德]马克思·韦伯.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类型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
- [4][美]保罗·诺克斯等.城市社会地理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98.
- [5][加]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161.
- [6][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97.
- [7][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59.
- [8][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性[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151.
- [9]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62.
- [10][英]齐格蒙特·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151.
- [11][美]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
- [12][德]齐奥尔格·西美尔.时尚的哲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98.
- [13][英]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16.
- [14][德]齐奥尔格·西美尔.大都会与精神生活[A].汪民安等.现代性基本读本[C].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645.

- [15][美]保罗·诺克斯等.城市社会地理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04.
- [16][美]阿尔温·托夫勒.未来的冲击[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90.
- [17][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58.
- [18][美]阿尔温·托夫勒.未来的冲击[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91.
- [19][美]阿尔温·托夫勒.未来的冲击[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94.
- [20][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第4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74.
- [21][加]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62.
- [22][英]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05.
- [23][美]R.E.帕克.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43-47.
- [24][德]齐奥尔格·西美尔.时尚的哲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187.
- [25][德]齐奥尔格·西美尔.大都会与精神生活[A].汪民安等.现代性基本读本[C].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640.
- [26][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149.
- [27]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0.
- [28][英]齐格蒙特·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56-57.
- [29][德]齐奥尔格·西美尔.大都会与精神生活[A].汪民安等.现代性基本读本[C].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642.
- [30][英]齐格蒙特·鲍曼.通过社会学去思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57
- [31][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95
- [32][英]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36.
- [33]蒋政武.人有病,天知否?——“冷漠生存”报告[J].社区,2002.2(10-12).
- [34][英]齐格蒙特·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315.
- [35][美]克瑞珊·库玛.现代化与工业化[A].汪民安等.现代性基本读本[C].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499.
- [36][美]克瑞珊·库玛.现代化与工业化[A].汪民安等.现代性基本读本[C].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500.
- [37][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第4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95.
- [38][美]R.E.帕克.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24.
- [39][美]内尔·诺丁斯.学会关心——教育的另一种模式[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150.

When Moral Education Encounter Urbanization

Gao Desheng

Abstract: The urbanization is an encounter for human as well as moral education at present stage. Being full of Strangers, urbans are reduced into an unknown world. Urbanites in this unknown city have double faces: freedom and rationality vs. indifference and isolation. On the one hand, moral education is supposed to adopt and embody the spirit of urbanization;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shall not attempt and accomplish nothing in this process. At present stage, one major mission of moral education is to surmount the Ethic of Stranger arising from urbanization when adapt to urban life.

Keywords: urbanization; the ethic of strangers; encounter; moral education

收稿日期: 2008-02-12

作者简介: 高德胜, 教授, 硕士生导师,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专职研究员。